

参与·网络·仓储： 记忆实践路径下的数字记忆建构

刘 晗

摘要：数字记忆作为一种全新的记忆形态，带来了社会记忆的形态演变和全球范围内记忆的建构与传播。在动态发展的记忆实践路径之下，需要从传播学视野深入探讨未来如何依托数字媒介展开记忆建构的问题。采用社会记忆研究的基本要素结构分析方法，具体阐释了数字记忆主客体及其关系的变化，以及如何经由中介弥合建立统一的数字记忆建构体系。研究表明，主体层面可在“参与传播”语境下进行数字记忆共建，客体层面可通过“数字化迁移”与“网络化连接”实现数字记忆再生产，中介层面可借助“数字人文仓储”构建全新记忆平台。研究为数字时代记忆建构理论的系统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参与；网络；仓储；记忆实践；数字记忆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3；G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3)04-006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XW111)

记忆与人类的记录、传播活动密不可分。通过记录，人类将记忆的能力拓展于身体之外，从而使得记忆突破个体心理，有了进一步社会化的可能；通过传播，个体的记忆在社会之网的勾连互动中不断碰撞，进而形成集体的和集体的记忆。从“结绳刻契”到“书写文字”，记忆的社会化系统不断演变，又在印刷术、照相术、电讯术等一系列传播技术的外力作用下不断突破。记忆进化到数字时代，记忆方式发生更为重大的变革。数字媒介技术的广泛应用，生产了大量数字文本、可视化信息、虚拟影像、互动视频、时空数据等崭新的记忆形式，并通过数字媒介功能的不断放大，使得记忆变成一种具有全球共享性的信息和资源，形成人类记忆新的形态——数字记忆。

从传播学视野展开对记忆的研究，是对早期集体记忆研究将“媒介”与“集体记忆”视为相互独立范畴的局限性的突破，而将媒介作为集体记忆形成的重要机制。其最初主要关注媒介在记忆运行过程中的价值与功能，将“媒介如何形塑集体记忆”作为其核心命题，呈现出“叙事-话语”的建构主义分析路径和“媒介-技术”的技术分析路径。前者倾向于将集体记忆视为主观建构的产物，后者则着重将作为客体的集体记忆看作媒介技术的物质性产物，但两种研究路径尚缺乏“主客分析的弥合”，以及“对集体记忆与社会层面联系及发生机制”的探讨^[1]。随着数字传播技术对人类记忆方式的深刻改变，传播学视域下的记忆研究发生着“实践转向”，即将新闻生产视为一种记忆实践，其研究重点在于媒介的生产与消费、受众的分析、意识形态以及形塑公共记忆的动态过程等社会结构层面的因素^[2]。正如奥利克所强调，集体记忆应是“所做之事”，而非“所拥有之物”^[3]，记忆不应仅关注“过去如何经由媒介建构”，还将更为侧重未来“如何依托媒介来展开记忆实践”等一系列问题，如从数字记忆的“镶嵌性”理论视角去理解传统媒体与纪念文化如何与线上世界相勾连，形塑数字纪念空间的例子^[4]。在新媒介生态下，“数字记忆”(digital memory)和全球记忆(global memory)的概念被提出，“数字记忆”改变了记忆生产、存储、流通、获取与利用的机制，也使得“集体记忆”呈现出向“连接

记忆”(connective memory)^①范式转变的趋势,研究者更为关注记忆个体的能动性力量,以及将记忆从面向过去到面向当下与未来的记忆实践问题的探讨^[2]。

传播学视野下记忆研究的实践转向,一方面使得传播学从以往对媒介记忆文本的研究重心转向对媒介相关的记忆实践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使得数字记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需要更为关注记忆如何通过网络的连接与传播而获得可共享性,以及数字媒体如何在文化、政治、技术和社会的场景中,通过与其他社会机构或社会群体的互动来进行记忆和遗忘^[5]。其指涉与“记忆生产”相关的一系列实践性问题,包括数字记忆建构的“组织方式”等问题的探讨。这一研究路径,在某种程度上正与社会记忆的“主体—客体—中介”^[6]的基本要素结构相暗合。

鉴于此,本文从传播学视野并结合社会记忆研究的要素结构,对数字记忆实践进行分析重构,既探讨数字记忆建构主体的相互关系与组织形式,以及数字记忆的对象世界及网络化再生产的途径,还考察连接记忆主客体之间的媒介平台及其整合设计路径,从而经由媒介实现主、客分析的弥合统一,搭建起反映数字化生存特征的记忆运行机制,使其更为接近社会记忆的动态化本质,进一步充实传播学视野下数字记忆建构的理论资源与实践构想。

一、数字记忆建构的基本要素结构分析

一切社会实践活动都包含着主体、客体和中介这三个最基本的要素。“主体和客体构成其骨架结构的两极,工具手段等中介系统则是联系主客体关系的变量”^[7]。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媒介实践的社会记忆活动也具备“谁(建构)的记忆、记忆什么、如何记忆”这一基本要素结构,据此构建传播学视角切入记忆实践的三层结构框架。

(一)主体、客体、中介——三种记忆要素切入的研究方法

主体要素是研究特定主体基于何种现实需求、主观愿望和利益诉求参与社会记忆实践,以及如何形塑、传播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是“人类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6],它集中体现了作为记忆主体的人的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即生活在记忆场之中,既是实践基础上的记忆存在物,也是记忆的建构者。从抽象的记忆主体而言,哈布瓦赫首次提出“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性”^[8],将记忆纳入社会框架之中;康纳顿则进一步强调,社会记忆不是个人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由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的共同记忆^[9];阿斯曼将集体记忆细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10],强调后者存在于人所构建的文化体系之中;诺拉则将这些能够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形象地称为记忆的场,比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址、传统节日和仪式等,通过这些人类所构的“记忆之场”^[11],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才能将传统代代延续下来。

客体要素主要探究主体实践活动的对象,即与主体相对应的外部世界。以特定的记忆对象为出发点或切入点,从客体的视野对记忆对象及所处的环境进行考察,从而形成关于特定记忆事实的历史观念^[12]。记忆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具有多元化的内容结构,而面向主体传播的社会记忆客体也具有无限变化与多样性,它们对于社会记忆及其整体更新进化发挥作用的方式、性质等均有较大差异^[6]。在中西方的社会记忆研究中,有诸多对记忆客体的研究探讨,从早期关于越战、纳粹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研究,到今天世界范围内各种关于“抗疫”的记忆实践,可以发现记忆形态由于其所依存的客体环境的改变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网络空间中关于“抗疫”的Vlog自传式记忆书写,借助视频内容生产和受众记忆文本的交织,构建了新的时空场域和情感记忆的历程^[13]。

中介要素是对特定记忆媒介进行研究,以探讨“连接主客体关系”的媒介“记忆了什么”和“如何记忆”,以及媒介所具有的兼具存储与整序、评价与监督、扩散与传递等综合性功能^[14]。王明珂把社会记忆定义为“在一个社会中借各种媒体保存、流传的‘记忆’”^[15];保罗·康纳顿对“仪式”这一社会记忆传承中介的研究具有突出的代表性,他认为“有关过去的意象和记忆正是通过仪式性的操演

^①“connective memory”原文译为“联结记忆”,根据最新文献将“connective”统一翻译为“连接”,以下同。

传递和保持的”^[9]。在媒介所连接的记忆主客体结构关系里,媒介不仅是工具和手段,也是记忆最直接最典型的形式。因此,数字记忆实践活动既需要考察传播媒介的组织形式,也需要探求媒介具体以何种技术、方法或工具来实现信息的传播。

(二) 基于记忆基本要素结构的数字记忆建构层级

数字记忆建构主体层级是数字记忆建构的行动者,既包括行动中的施动者,也包括受动者。因为从主体层面来看,数字记忆建构可以看作是数字时代的主体出于内外部因素刺激而产生的对记忆对象的理解、选择、传播及接受的过程。在数字赋能“人人都是传播者”的背景下,一切与数字记忆实践相关的主体都被赋予了“参与建构”的可能性,这不仅包括媒介、公共组织等既有的社会记忆机制,也包括网络中活跃的数量庞大的网民个体,甚至还包括“自动化记忆”的“非人化”^[16]技术主体,其中既有主动的显性建构方式,也有被动的隐性建构方式。确立记忆建构主体以及各主体之间的有机联系,是理解数字记忆实践的必要前提。

数字记忆建构客体层级是数字记忆建构的对象世界。从客体层面来看,数字记忆的形态被外化为一种区别于书写形式的数据汇集于网络之中,网络不仅仅提供了构成记忆的原材料,更指向用户在形成自我认知过程中的各种历史痕迹,从而使得日益虚实融合的网络世界愈来愈趋向承载记忆的全部客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记忆实际上是人类数字化生存的历史“印痕”^[17],是一种存在于网络关系中的数据化记忆。即便是将现实世界迁移到网络中的记忆实践,也是一种基于数字逻辑的网络化“再生产”,并进一步强化了数字主体虚拟生存的体验。

数字记忆建构中间层级是数字记忆建构的媒介平台。从中介层面来看,数字人文的技术驱动和媒介融合的深入发展,使得各种传播媒介借助数字化手段呈现出平台化、集中化的发展趋势,成为数字记忆的重要载体。“仓储”原本是物流领域进行货物管理的相关概念,计算机领域用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e)指“面向主题、集成、稳定、随时间而变的数据集合”,后延续这一概念的开放性和集成性特征,将其进一步应用到网络环境中具有“高度多样性特征”的各种数字对象的管理和保存,就产生了“数字仓储”的概念^[18]。将“数字仓储”运用于数字记忆实践领域,实际上是贯通了“数字”与“人文”的关联,也是数字人文与数字记忆深度融合的结果。(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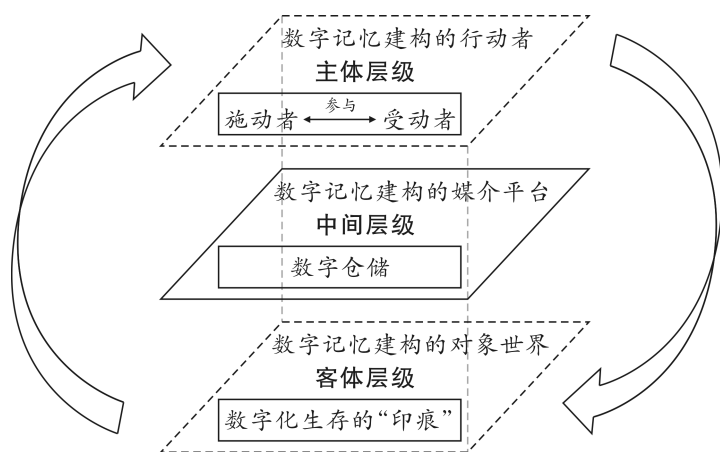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记忆基本要素结构的数字记忆建构层级

以上对数字记忆基本要素结构及相应研究视角的分析,虽然是采用了切入分层式论述,但事实上,任何一个研究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以社会记忆系统为前提的。对数字记忆建构而言,主体层级研究以记忆实践主体为出发点,在考察各主体以何种方式“参与”记忆建构行为的同时,也必须考察记忆的对象范畴,探讨其呈现的内容及形态,以及如何运用不同的媒介技术来重塑记忆;客体层级研究以特定的记忆对象为范畴,考察其对象所依存的“网络社会”文化样式,但也要以一定的媒介平台为

依托,探究不同主体对记忆事实的理解、认知与传播;中间层级研究虽然主要探讨借助何种智能化媒介平台来重塑记忆,但仍需对记忆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有充分的理解,并详细考察不同主体对这些内容或记忆事实的认知,以便采用更好的技术、方法或手段进行记忆资源的组织、整理和传播。所以,任何一种要素研究都不是被割裂在整体之外的,从不同层级进行探讨只是为了研究的深入与拓展,这一过程其实始终置于数字记忆的整体结构之中。

二、主体层级:“参与传播”下的数字记忆主体共建

进入数字交往时代,“技术空间强化了主体的自我开放性与价值诉求机制”^[19],促成了文化保存范围多元主体的指向,这为各相关利益传播主体更为主动地参与记忆实践提供了契机。在技术、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下,“参与”作为一种传播理念,其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在各个领域表现日益突出且多样,为多元主体参与留存建构记忆提供了路径,为展现生活世界的原生态和多样性提供了可能。

(一)发展传播学语境下的“参与”理念内涵

在发展传播学的语境下,“大多数的工作都趋向于传播和参与”。参与传播的观念强调“文化身份”“民主化”和“各个阶层的参与”,涉及范围包括国内国外、本土及个人,它指向的是一种策略,即不论是个体还是集体,都有表达自己的权利。^[20]

“参与”作为一种传播的理念与实践,其实已遍及创意生产、社区生活、民主政治、教育实践等多个领域。国家治理理论为“参与”提供了政治合理性依据,数字技术的发展则赋予“参与”更多的实现途径。“参与”甚而上升为一种文化,渗透进人们生活和工作的诸多方面,如亨利·詹金斯提出“意义与知识的合作生产、问题解决的共享”的参与文化^[21],在信息、传播和媒介领域,“参与”成为一种社会化标签和用户互动行为的助推力。

克里斯托弗·凯尔蒂总结了与“参与”相关界定的七个方面。从目标与任务来看,参与者不仅是任务的承担者,而且对所担当的任务负有明确其目标的职责;从对资源的控制来看,参与者担负资源的生产之责,也享有接触、使用,甚至控制资源的权力;从教育作用来看,参与可以学习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如何有效参与;从参与权利来看,可以选择是否参与以及相对地是否退出;从言论自由来看,参与者在参与的过程中享有话语表达的权力,尤其是当这一行为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事情发展的结果;从结果测量来看,对于参与所取得的成果需要进行有效的评估,并以一种可视化的结果呈现出来;从参与社交性而言,参与者与参与的事务以及其他参与者之间的交流、情感及社交等形成了参与中的社会网络。当然,并非每一次参与实践都会涉及以上所有特征^[22],但这一理念已深入到各种文化传播活动的研究与实践中。

在西奥多·夏兹金提出的实践分析要素^[23]中,“理解、目的、信念、计划、感情、情绪、技能”等多个方面都可被归纳为“行动者具身要素”类型^[1],这意味着实践行动的参与者有着复杂的指向和结构。数字记忆实践如何统筹协调各参与主体,调动不同需求、不同兴趣的主体积极性,通过各主体行为之间的互动、协作、融合、共建达成共同的工作目标,就需要深入理解“参与”的内涵,根据参与者的不同类型组织记忆实践,从而使记忆的构建范围更为广泛、视角更为多元,不断接近更为全面、真实的记忆。

(二)参与传播下的记忆主体共建实践

参与传播深化了记忆的“可加工”性,体现出记忆建构的本质。在数字记忆生态之下,多元主体进入记忆实践领域,不仅展现出复杂的供给图景,而且加速了记忆的生产与流通等环节^[16]。从数字记忆的实践来看,呈现出三种主要的主体“参与”建构类型。

1. 记忆联盟中的组织参与共建

记忆作为一种社会共有的文化资源,所涉及的记忆存储机构较多,图档博等这一类原本独立运行的组织,因为所共同具有的记忆功能属性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被赋予了“记忆机构”或“知识型组织”的定位^[24]。以“LAM”(library, archive, museum)或者“GLAM”(gallery, library, archive, museum)

为代表的记忆机构联盟,常常通过共同目标或项目机制建立参与协作关系,从而共同建构记忆。

记忆联盟组织的参与主要通过馆藏资源的数字化整合与网络信息保存来实现。前者集成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联盟各机构资源,通过网络构建数字信息传播平台,为公众提供多种形态的数字文化服务,如世界数字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欧洲“时光机”、缅因记忆网、沃巴什谷视觉与声音记忆工程等;后者直接将网站视作记忆的重要资源,但由于网络信息保存面临海量数据的选择甄别、归档技术等方面的综合挑战,单一机构难以独立完成,往往由多机构共同参与、共担风险、共享资源,对具有记忆价值的网络信息进行采集与归档。这类参与联盟在不同范围、不同层级都有所体现,地区层面如纽约艺术资源网络保存联盟(NYARC)由纽约当地的博物馆、收藏馆等多家公共机构组成;国家层面如英国网络归档联合会(UKWAC)、美国国会图书馆(NDIIPP)等;国际层面如涉及20多个国家的国际互联网保管联盟(IIPC)。

2. 商业传播中的有偿参与共建

商业传播(business communication)是大众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纯商业性为特征,以宣传企业产品、塑造企业形象为目的信息传递活动^[25]。早期商业机构参与记忆实践主要是提供管理执行的外包服务,并不参与资源的管理或知识贡献,所涉及的商业传播行为较少。随着商业机构在记忆项目和产品开发中的参与逐渐深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出现了为特定人群提供有偿性记忆的服务,与这一类型记忆实践相关的商业传播渠道也随之建立起来。

例如,Ancestry公司开发的全球最大的家谱网站,通过提供大量的在线家谱资源,吸引了数百万付费用户的参与传播和共建使用。Ancestry也是世界上最大的DNA服务提供商,借助这一商业背景,它将DNA检测服务与家谱网站联系起来,提供基于DNA的家谱追踪服务,这使得Ancestry拥有庞大的用户网络、独特的内容和规模化的技术平台。此外,Ancestry还借助在线社区提供用户参与的渠道,吸纳用户共建资源,用户可以在网络社区中创建自己的家族,通过保存家族成员的历史人文信息来分享家族的故事,邀请家人朋友共享记忆以维系现有的亲情血脉关系,发布公告寻找失散的家族宗亲,征集信息探寻遗忘的家族历史、发现并培养有潜力的家族人才等等。

3. 公共传播中的开放参与共建

公共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是指政府、企业及其他各类组织,通过各种方式与公众进行信息传输和意见交流的过程^[26]。“作为公共传播的大众传播”就是为了探寻如何将公共信息和知识进行有效的传播和扩散。从传播模式的变革来看,它重在强调“主体多元化”和“双向互动”;从场域论视角来看,它提出一种由专业媒体、平台媒体和自媒体协同互补的“对话式”的“公共传播场域”;从价值功能视角来看,它“旨在促进社会认同与公共之善”^[27]。

与商业服务的用户参与记忆实践不同,公共传播领域的记忆实践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参与,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吸收更为广泛的来源和视角为记忆提供原料,如纪念南京大屠杀的“线上公祭空间”等。在大众媒介主导的公共传播中,记忆机构向广大公众提供授权,为公众提供包括记忆资源构建和平台工具利用等参与途径。新加坡记忆工程就是这一类典型代表,它实际由二百多个组织参与协作,并吸纳了近二百个志愿者团队的工作。新加坡记忆门户为每个新加坡人提供账号安放他们的记忆,并开展线下外展活动以加强他们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新加坡人贡献他们的记忆。此外,在面向社群的公共传播中,还有以社区为主导,由社群成员共同构建其历史的记忆遗产项目。例如,澳大利亚原住民Koorie口述记忆项目,其主要的参与者是当地的土著居民,曾因“白澳政策”而成为“被窃走的一代”,他们自愿提供当年的记忆、自主决定其留存,并接受社群工作者和研究者提供的平台和技术指导,从而形成了一个自主管理记忆的平台。

从以上代表性的参与式记忆实践可以看出,参与式建构为数字记忆实践提供了有效的样式,但现有实践中数字记忆资源的分散性、碎片式常态,给数字记忆共建模式的深度应用带来了阻碍。为适应我国国情,需形成“政府指导下,官方记忆机构为核心,民间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公众主体群策群力,数字技术公司提供支撑”^[28]的数字记忆主体共建格局。

三、客体层级:“数字化迁移”与“网络化连接”再生产

客体层级考察的是数字记忆的对象世界以及针对这一对象客观资源的生产与再生产途径。阿莱达·阿斯曼借用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的观点指出,“记忆不仅是一种复制,而是一种具有生产力的能力”^[29]。对于客体层面的数字记忆建构来说,它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再生产”过程,因为记忆资源是不断累积、积聚的结果,其形成、累积和利用的过程具有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性、连续性、加工性等典型特征,因此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出对记忆资源的“发掘、加工、形塑”等建构行为,而且体现出记忆实践的连续性和资源生产的动态性。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数字记忆的再生产体现为关联递进的两种路径——数字化迁移和网络化“连接”,并最终形成基于网络的数字记忆再生产体系。

(一)“数字化迁移”再生产

“数字记忆”概念导出主要源于现实世界中各类记忆遗产的数字化迁移实践^[30]。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启的美国记忆工程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尝试,它通过创建一个与“美国记忆”同名的多媒体网站,提供了大量的数字化记忆资源。这意味着数字技术与记忆实践的结合,使得依托传统媒介所承载的记忆形式被逐渐信息化和数据化,成为一种以数字形式长期保存、开发和利用的新型记忆形态。

虽然记忆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数字记忆的核心资源仍然是那些具有“原始记录属性和保存价值”的“社会记忆资源(Social Memory Resources)”^[31]。随着现实世界数字化的进程,历史传承的人类记忆也就呈现出向数字化迁移的总体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处理,原本散落各处的记忆碎片经由数字化实现了信息的集中存储与传播。

数字记忆再生产的重要“原料”就存在于这些社会记忆资源之中,“只要对记忆对象的史实考证、文化阐释与情境表现”有参考作用,就要尽可能搜集汇聚起来^[32]。“中国记忆”项目就非常注重将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资源进行整合与传播,搭建出一个包括“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专题文献,口述史料、影像史料等新型文献,手稿、信件、照片和实物等信息载体”^[33]的数字化文献资源集合。纵观此类记忆项目,多是基于现实世界进行的数字化迁移,其中主要涵盖了三种已有记忆资源的数字化再生产。

一是刻写记忆资源。即通过“表意符号系统”所刻写留存的记忆资源,主要包括档案、史料、书报、方志、家谱、托片、书画、影像等历史记录。刻写记忆资源分布广泛、结构类型多样,各记忆主体在漫长历史岁月中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沉淀了卷帙浩繁的文化遗产,而且记录和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文化、教育、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构成一个珍贵的文化资源宝库。这一类记忆需要借助博物馆、图书馆与档案管理领域长期积累的数字化技术规范与经验积累实现数字化的转化与开发。

二是体化记忆资源。即依赖人的身体动作、语言、手势等信息传递的记忆资源。它们主要经由民间个体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如艺术表演、技能展示、工具操作、工艺品制作、文化仪式等,以及由亲历者讲述的未经文字记录的历史传说、家族故事、奇闻逸事、个人经历或亲身见闻等口述资源。这些经由个人口耳相传的记忆,是关于各种文化起源、节日、婚丧、诞育、手工艺、饮食、服饰、交通运输、民间贸易等重要的传统资源,是个体鲜活的往事回顾,可以填补刻写记忆的缺漏。要将这些尚未被刻写的记忆转化为数字形式,需要通过田野调查、口述访谈、历史考证、比较分析、影像记录等方式进行数字化采录,并结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动画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新技术的融入,实现生动形象的再现与表达。

三是空间记忆资源。即文化遗产中的场所、地点、遗址、古建筑、石窟、石刻、壁画等这一类有形的、不可移动或不便移动的物质文化遗迹或遗存。自然风光中的山川河流、自然植被等物质环境,古村落建筑中的特色民居、祠堂庙宇、街道牌坊等传统建筑,院墙、水榭、石栏、石台、瓦当、雀替、斗拱等院落布局和特色构件,石雕柱纹、砖雕纹饰、壁画窗花等建筑装饰都是历史文化记忆中极为重要的媒介,“不仅能将回忆固定在某一地点而使其巩固和证实,还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34]。这种空间记

忆也需要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将其转化为信息内容进行固化和释放。当前的数字记忆项目所呈现的场所景观主要是以图文、视频资源为主,各种“数字遗产”项目则更为注重对空间资源的场所研究及数字修复,对大型文化遗址或实物景观进行虚拟场景重建。随着数字记忆资源的深度整合,数字记忆项目可以更多地融合不同资源类型,尤其利用空间资源开发出逼真的数字场景,为用户提供现场沉浸感受,传递更为直观的记忆效果。

然而,“数字化迁移”并非数字记忆生产的最终环节,由于记忆的对象世界向网络发生着根本性的倾斜,数字记忆更为直接地深入到网络化实践之中。这也就意味着,记忆不仅存在于现实社会,也产生于网络世界,不仅发生着传统媒介的数字化转型,也存在着网络原生数字记忆的建构。

(二)“网络化连接”再生产

在现实世界不断进行数字化迁移的同时,网络也已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发展成为一部强大的“知识机器”^[35]。安德鲁·霍斯金斯提出的“连接性转向”,即强调技术使得人们连接或栖身于数字化的社交网络之中,进而重塑时空和记忆^[4]。

因日益普及而已成长为“第一媒介”^[36]的网络,除了通过数字迁移而转移的信息资源,也有着越来越多被标识为“Born Digital”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它是直接在互联网活动中产生的或仅仅发布于互联网并仅以数字形式传播利用的网络信息资源^[37]。网络的“连接”性进一步激发了巨量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不断涌现,相对于转化型的数字化信息来说,它代表着网络信息资源发展的更高阶段。

对应于记忆的真实要求,网络原生数字资源是人类数字化生存的历史痕迹,同样具有记忆保存的价值。世界范围内所开展的各种互联网保存项目,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Twitter 保存项目”、中国“国家数字记忆计划”等就是面向网络资源的记忆。相比于现实世界遗产的数字记忆建构,这类记忆项目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进展上还与之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也缺乏将两者整合构建的深入研究。但新加坡记忆工程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例,其所开创的全民参与记忆建构的在线互动栏目,既是记忆采集与传播的手段,其本身也构成了新加坡记忆的一部分。

数字时代的记忆更需要原生数字资源的注入而不断“修正”^[38]建构。从文化遗产所指向的记忆范畴来看,网络原生数字资源内容庞杂多样,质量参差不齐,但却彼此“连接”形成一个巨大的资源库。由约瑟夫·德拉建立的旨在纪念伊拉克战争死难平民的“Iraqimemorial.org”网站,就是这样一个动态、开放、扩张和持续进行中的记忆场所,它将伊战的纪念过程“预媒介化”,向全世界艺术家持续征集即时性的“提议或构想”,收录了包括图表、画廊规划、照片、视频和多媒体展示等在内的艺术家作品^[39]。

此外,网络中基于社交媒体产生的关于历史文化的博客文章、原创多媒体资源、线上民俗活动、艺术展示、语言学习等;通过互联网进行生产传播和提供利用的电子期刊、图书、报纸、学术论文等;政府、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等面向社会发布的文化政策信息、教育教学信息、语言教学资料、文化历史研究、宗教事务信息等;以及个人主页上公开发表的体验性文字记录、摄影照片、动画影像等都是重要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它们记录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轨迹,是数字记忆再生产的重要原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字时代的记忆越来越依靠数字网络,并日益凸显“持续网络化”的本质^[16]。这是社会记忆数字化的时代特征与根本趋势。

四、中间层级:以“数字人文仓储”构建全新记忆平台

数字人文对信息的全新组织和处理重新建构了“我们理解、组织和判断世界的方式”^[40],改变着数字记忆的实践机制和创新潜能。这种潜能一方面赋予记忆主体“崭新的技术和方法”,使其具备对记忆的时序分析、空间分析、文本分析和社会关系分析等诸多技能,另一方面为记忆的客体提供了资源整合的路径,如建立资源联合目录、对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构建本体模型、开发数据分析工具、面向用户提供服务平台、实现虚拟现实等增值服务^[41]。从数字人文的视角来看,数字记忆的采集、生成、传播需要借助新型媒介构建一体化平台,在向记忆主体快速高效传播记忆的同时,还具备从记忆

客体源源不断地获取及生成更多记忆的功能,从而借由媒介实现主客体关系的弥合统一。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具有“存储、整序、扩散、传播”等多功能的“数字人文仓储”作为综合性记忆平台更能促进记忆的生产与传播,也是数字人文对整体性、功能性记忆建构的本质要求。

(一)“数字人文仓储”的记忆适用性

在数字人文学科的发展之下,“数字人文仓储”概念被提出。“数字人文仓储”(Digital Humanities Repository, DHR)是适应数字文化信息服务集成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需求的服务形态,它集合“数字人文”与“数字仓储”两个主要概念的基本内涵,是基于数字人文的视角,对网络环境下各类数字资源对象进行开放性、集成性保存、加工、组织和管理服务的思考提炼^[18],其理论内涵及实践价值对于数字记忆的全面承载和面向大众的分享传播有着参考性和适用性。

“数字人文”的要旨就是在对社会人文领域对象进行数字保存的基础上,利用各种数字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深度挖掘与优化整合,以此创新开发与之密切相关的各类数字应用,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多层次需求。“数字人文仓储”用一种通用型的人文数据保存应用环境,将与人文主题相关的不同类型数据,包括网页等都纳入数字保存的范畴。因其中的“Repository”本身含有知识库之意,所以对各类数字对象的保存并不是简单存储即可,还需要使其符合现代知识管理的核心,从信息内容管理层面面对各类数字存储对象进行一定深度的内容整合和知识提取。因此,“数字人文仓储”的应用有助于推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数字服务对象的信息深度整合与应用,满足特定目标用户群体多层次的信息需求。

数字记忆本身具有与数字人文交叉融合的特征,记忆作为人类社会普遍的精神现象,是数字人文领域中独具特色的资源类型,而“数字人文仓储”呈现出的三大特征有助于开拓数字记忆实践与传播路径。其一,“数字人文仓储”具有集成性特征。不同于各类传统记忆机构分散独立的资源存储系统,它可将同一主题之下的多形态资源——文本、图片、音频、视频、3D动画、虚拟场景、网页文件、时空地图等多媒体信息集成纳入存储的范围。其二,“数字人文仓储”以知识构建为核心。数字人文仓储不仅是基于主题的信息资源库,更是同一主题知识的信息集成库,它基于知识本体进行相关信息资源的采集、组织和知识架构,不仅能将资源对象所蕴含的知识体系纳入保存范围,还能通过深度挖掘构建知识图谱,呈现系统化的知识景象,而这正是记忆的价值之所在。其三,“数字人文仓储”具备多维度聚合的特征。它集成了数字资源保存、数字信息传播以及数字社群等网络化信息服务的多重功能,因此它能对特定主题进行信息资源的多维度聚合,既包括对文化信息资源的在线保存和管理,也能提供数字创意产品的展示、体验、传播及互动分享。

(二)基于仓储的全新数字记忆平台构建:兼具数据集成、知识融合、智能传播的三维空间

多功能的“数字人文仓储”使数字记忆平台构建有了可参照的目标,结合信息的三维空间理论^[42],可从编码、抽象和扩散层面提出数字记忆平台的功能设计理念。编码空间是记忆资源进入数字仓储的第一层空间,它需要利用多样化的信息技术对现实世界和网络空间的记忆资源进行采集、记录与提取,对数字化信息进行合理的归类和特征描述;抽象空间通过对所存资源的内容进行深度加工处理,以实现记忆资源数字化和标准化基础上的资源关联、资源聚合及资源服务的全过程;扩散空间是知识传播与利用的场所,在大数据可视化情境之下,知识在扩散空间的传播速度、覆盖范围以及利用情况都能得到有效评估^[43]。由此将“数字人文仓储”概念运用于数字记忆这一领域,可构建具有数据集成、知识融合、智能传播多重功能的数字记忆平台。

第一,构建数据集中存取的数字记忆平台。由于知识的分散性与语言文字的多样性,关于同一知识的记忆资源往往分布在不同专业领域、不同载体形态、不同文字的记载之中,是处于离散状态的“记忆碎片”。例如,任一历史人物自身都带有与其相关的出生背景、成长经历、社会活动、参与事件、主要成就等信息,然而关于这一实体对象的媒介记忆却是“碎片化”的,既缺乏“历史的时间轴线”,也失落了“系统、线性的逻辑阐释”^[44]。基于仓储的数字记忆平台通过面向特定的主题和对象“人文实体”进行集成性构建,将相应学科或实践领域的人文实体表现形式和各种多媒体记录方式进行集

成,利用机器与人工的结合进行目标明确的信息捕捉、识别和分类,并通过设置单一的入口访问方式使用户能获取原本需要从多种异构系统中逐一检索出来的各类信息,促使原本分散的记忆碎片在数字平台的整合中得以再现,从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历史全貌。

第二,构建知识深度融合的数字记忆平台。建立人文实体的本体模型是构建数字仓储的重要基础^[18],借助数字人文仓储本体知识构建的规范和流程,数字记忆平台可以根据实际应用情况持续完善,基于主题知识本体进行跨领域信息资源的采集、组织、挖掘与呈现,包括“跨地区”“跨机构”“跨语言”“跨学科”“跨文献”等知识融合。不同来源的记忆蕴含着人们生产与生活中的不同信息、经验和智慧,其知识价值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整合开发;面对不同语言背景的用户需求,不仅需要在这类信息之间、信息与实体对象之间建立丰富的语义关联,还需要为用户解决跨语言交流的障碍。数字记忆平台可利用统一标识符技术实现不同语言文字版本所对应的相同本体之间的等价语义关联,借助不同语言之间的映射关系,用户可以通过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文字理解与其相关的任一语种的信息,只需通过必要的信息提示,就能完成跨语言信息检索及信息获取利用等行为^[45],从而形成一种网状的信息传播结构。

第三,构建智能化、多功能传播的数字记忆平台。数字人文仓储也是数字人文项目成果的展示平台,这一平台所具有的多维度智能信息服务特征,对于数字记忆的共享与传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喻国明等认为,智媒化促使传播的内容、形式和主体产生新的变化:单一传播内容转向全息传播,大众化的传播形式转为精准传播,单一传播主体转变为人机协同^[46]。仓储式平台的传播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在线信息全息化呈现,利用数字技术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联通,使得虚拟现实和真实现实共生于同一环境,内容上构建具有富于感染力、能调动全记忆感官的故事化叙事模式,形式上借助智能语音技术、可视化技术、虚拟沉浸技术等帮助用户深度体验、激发记忆通感;二是提供精准化在线服务,利用人工智能排除语言歧义或信息多义等因素带来的信息查询与检索干扰,对与用户需求相关的语义信息进行准确提取,从而提供更加丰富、更为智能化的检索结果,不断激活新的记忆元素;三是在线交互性服务,尤其是通过主题社群的构建,聚集对同一主题有着一定关注度的目标用户群体,为其提供沟通、交流和互动的渠道,例如通过智能查询、辅助创作等方式实现人机对话与协同,或在平台所聚合的虚拟社群中为对同一问题感兴趣的用户提供随时随地的互动和交流,从而影响思想、知识与价值在更大范围内的记忆与传播。

五、结语

记忆是人类世界的一种精神现象或文化现象,它因其社会化而构建了人类文明的“知识世界”。从个人到集体、从历史到社会,记忆不只是自说自话式的个人呓语,而不断由内向传播向外在世界拓展。它一旦与数字相连、与网络相接,将包容并超越人类社会以往的任何记忆形态,不仅在量上极度扩张,而且形成一种趋向共享型的“全球脑”(global brain)^[47]记忆的趋势,甚而会彻底改变人类未来的思考、认知与实践。

因此,作为一种“连接”于网络之中的数字记忆生产实践将与缓慢运行、分散建构的传统记忆大异其趣。实践路径下的数字记忆建构研究,应更加侧重不同类型的记忆主体是如何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参与互动,或依托网络媒介进行记忆再生产行为及其背后的社会实践逻辑。从记忆研究的内在要素结构来看,它本身是一个自成系统的实践体系,包含着主体层级的数字记忆参与式共建,客体层级的数字记忆网络化再生产,中间层级的数字记忆仓储平台构建。具体来看,将“参与”理念运用于记忆实践,既能强化不同主体在记忆建构过程中的协作关系,又能扩大记忆资源开发的主体范围和记忆价值的传播渠道;网络化再生产不仅依托网络进行记忆的生产 and 传播,又将记忆对象拓展至来自网络中的更为广泛的原生数字资源;多功能的仓储式记忆平台是数字记忆建构的媒介,它凭借数字人文式的“丈量”^[48]方式,将网络中浩如烟海的文本与数据进行一系列聚类整合、数据分析与深度挖

掘的智能化处理,实现数字记忆的集成存取、知识融合、智能传播的多重功能。最后,数字记忆实践主体经由仓储平台所聚合的网络数字资源,实现其参与共建的终极目标,建构出一个有序、创新、真实而又连续历史与未来的数字记忆宫殿。

参考文献:

- [1] 潘晓婷,陈莹. 记忆实践:传播学视域下集体记忆研究的路径转向. 新闻界,2021,7:55-63.
- [2] 陈振华. 集体记忆研究的传播学取向. 国际新闻界,2016,4:109-126.
- [3] J. K. Olick. Collective Memory: The Two Cul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1999, 17(3): 333-348.
- [4] 李红涛,黄顺铭. 一个线上公祭空间的生成——南京大屠杀纪念与数字记忆的个案考察.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 1: 5-26+126.
- [5] 李红涛,黄顺铭. 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新闻记者,2015,7:36-45.
- [6] 孙德忠. 社会记忆论. 武汉: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 [7] 夏甄陶. 论认识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1987,2:3-20.
- [8]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9.
- [9]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0;40.
- [10] 金寿福.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 外国语文,2017,2:36-40.
- [11] 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黄艳红,查璐,安康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8-80.
- [12] 丁华东. 论档案记忆研究的学术坐标. 档案管理,2011,2:9-13+5.
- [13] 罗坤瑾,陈丹妮. 从媒介按摩到情感修复:抗疫 Vlog 的生产实践逻辑. 新闻与传播评论,2022,4:48-60.
- [14] 胡燕. 走向公众——档案接受理论研究.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123-138.
- [15] 王明珂.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历史研究,2001,5:136-147+191.
- [16] 吴世文,贺一飞. 睹“数”思人:数字时代的记忆与“记忆数据”. 新闻与写作,2022,2:16-24.
- [17] 周耀林,刘晗. 数字记忆建构:缘起、理论与方法. 山东社会科学,2020,8:50-59.
- [18] 赵生辉,朱学芳. 数字人文仓储的构建与实现. 情报资料工作,2015,4:42-47.
- [19] 张军锐. 颠覆与重构——数字交往时代的主体性研究. 上海: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 [20] 瑟韦斯,玛丽考. 发展传播学. 张凌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168;150.
- [21] 亨利·詹金斯. 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 杜永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3-14.
- [22] 周文泓. Web2.0 环境中参与式的信息档案化管理:走向全景档案世界.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106-107.
- [23] T. R. Schatzki. Social Practices: A Wittgensteinian Approach to Human Activity and the Soci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5.
- [24] 张卫东. 全球化视野下中国 LAM 合作模式研究. 图书情报工作,2016,12:14-21.
- [25] 刘建明,王泰玄,谷长岭等.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672.
- [26] 董璐. 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
- [27] 冯建华. 公共传播的意蕴及语用指向.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4:113-119.
- [28] 刘晗,周耀林. 参与式共建:少数民族数字记忆建构模式及实现策略. 档案学研究,2022,3:60-67.
- [29] 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潘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4.
- [30] 周文泓,代林序,杨梓钊等. 基于数字记忆保存的网络信息存档实践进展研究及启示.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7: 37-42.
- [31] 赵生辉,朱学芳. 数字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机制研究. 档案学研究,2014,2:34-38.
- [32] 冯惠玲. 数字记忆: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3:4-16.
- [33] 中国记忆项目实验网站. 中国记忆项目简介. [2022-06-05] <http://www.nlc.cn/cmptest/>.
- [34] A. Assmann. Culture Memor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Functions, Media, Arch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44.
- [35] E. T. Meyer, R. Schroeder, J. Cowls. The Net as a Knowledge Machine: How the Internet Became Embedded in Research. New Media & Society, 2016, 18(7): 1159-1189.

- [36] 吴世文,何屹然. 中国互联网历史的媒介记忆与多元想象——基于媒介十年“节点记忆”的考察.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9: 75-93+127-128.
- [37] 陈红星,张淑芳. 网络原生数字资源:概念、特征与类型. 图书馆建设, 2010, 5: 1-4.
- [38] 牛力,刘慧琳,曾静怡等. 数字时代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重新审视. 档案学研究, 2019, 5: 67-71.
- [39] 安德鲁·霍斯金斯. 连结性转向之后的媒介、战争与记忆. 探索与争鸣, 2015, 7: 106-114.
- [40] 李慧楠,王晓光. 数字人文的研究现状——“2019数字人文年会”综述. 情报资料工作, 2020, 4: 49-59.
- [41] 张卫东,张天一,陆璐. 基于数字人文的档案文化资源整合研究. 兰台世界, 2018, 2: 17-20+16.
- [42] 马克斯·H·布瓦索. 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 王通寅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85-200.
- [43] 翟姗姗,张纯,许鑫. 文化遗产数字化长期保存策略研究——以“威尼斯时光机”项目为例. 图书情报工作, 2019, 6: 145-148.
- [44] 邵鹏. 媒介记忆与历史记忆协同互动的新路径. 新闻大学, 2012, 5: 12-15.
- [45] 赵生辉,胡莹. 面向数字人文的多语言藏学知识融合框架研究.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2020, 9: 39-49.
- [46] 喻国明,郭超凯,王美莹等.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智能传媒运作范式的考察——兼介美联社的智媒实践. 江淮论坛, 2017, 3: 134-138+150.
- [47] 欧文·拉兹洛. 全球脑的量子跃迁:新的科学如何改变我们及我们的世界. 刘钢等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0: 1.
- [48] Gerhard Lauer. 文化的数字丈量:“数字人文”下的人文学科. 庞娜娜译.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18, 12: 55-56.

Participation · Network · Warehousing: Digital Memor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Path of Memory Practice

Liu Han (Hubei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new form of memory, digital memory has brought about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emory on a global scale. Under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path of memory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deeply how to carry out memory construction relying on digital media in the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Using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method of the basic elements of social memory research, this article specifically explains the changes of subject and objec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n digital memory, and how to establish a unified construction system of digital memory through medi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digital memory co-construction can be carried out in the context of "participative communication" at the subject level. Digital memory can be reproduced by "digital migration" and "network connection" at the object level, and a new memory platform can be constructed through "digital humanistic storage" at the intermediate level.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systematic theory of memory constru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Key words: participation; network; warehousing; memory practice; digital memory construction

■ 收稿日期: 2022-11-22

■ 作者单位: 刘 晗, 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2

■ 责任编辑: 刘金波